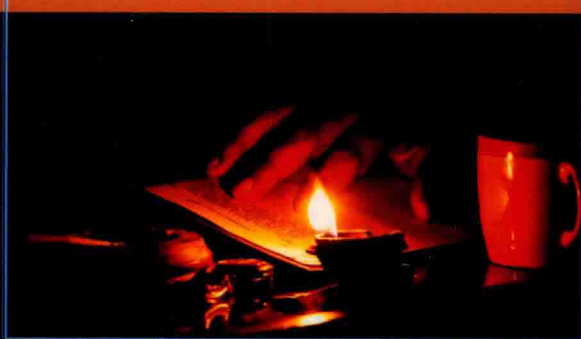


思想的软肋

SIXIANG DE RUANLEI

张继合◎著



张外借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思想的软肋

SIXIANG DE RUANLEI

张继合◎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的软肋 / 张继合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511-3823-9

I. ①思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9411号

书 名: **思想的软肋**

著 者: 张继合

书名题签: 李国文

责任编辑: 林艳辉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装帧设计: 陈 淼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9

字 数: 11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

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823-9

定 价: 25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 CONTENTS

- “金庸热”，暗藏硬伤 / 001
- 中国诗歌，排斥汪国真…… / 014
- “第三自然界”的疑问 / 029
- “明长城”，险象环生 / 043
- 理想职业，物我合一 / 056
- 女性，横穿“秘闻” / 085
- 生存，追寻的秘诀 / 105
- 唯一职责“文人梦” / 114
- 惩罚与追求 / 125

“金庸热”，暗藏硬伤

一、“金庸热”，独树一帜

著名作家金庸先生，原名查良镛，香港《明报》的创办人。1948年，他移居香港。1955年，金庸先生31岁时，创作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，持续到1970年，才推出最后一部“收山之作”——《越女剑》。金庸先生勤于笔耕，先后著有十五部“武侠小说”。虽说《越女剑》反映了他渴望置身于历史小说的强烈愿望，可惜，这仅是一种个人私愿，即使呈献出进步的特征。不过，跟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影响，关系并不算太大。

在读者群体庞大的华人世界里，金庸先生堪称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与社会活动家，他曾是香港最高荣衔“大紫荆勋章”的获得者，而且，一度成为“华人作家首富”。毕竟，金庸、古龙与梁羽生，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“三大宗师”。看来，金庸先生的头脑与文化素养，都发挥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效果：办报纸，赢得霸主宝座；写武侠，荣任天下至尊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推开了封闭内敛的国门，对于中国内地来说，自然遇到了很多新鲜事：或品性优异、或哗众取宠的新鲜玩意儿，纷纷跳上那座历史舞台。尤其引人注目的当是香港的“武侠小说”，几乎扯地连天地网罗下了“银粉丝”或者“铁观众”。金庸先生很快成为最受追捧的“明星作家”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



香港电视连续剧《射雕英雄传》在内地播出，很快，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与争斗细节，就像变魔术一样，征服了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崇拜对象。从此，“金庸热”陡然拉开了帷幕，那种盛事场景，绝不是过眼云烟，走走样子，反倒成为时空长久、规模宏大、受众云集、独一无二的社会文化洪流。

此后，金庸先生的作品一版再版，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竞相上演。“金庸热”在三十年中从未降温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金庸先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。北京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，率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引人注目的金庸小说研究课，显然，高校学者的介入，深切影响到图书阅读对于金庸作品的高度评价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先生，在《二十世纪小说选》中将金庸排名第四，列于茅盾等20世纪“中国文学大师”之前。与此同时，金庸小说研究渐成热潮，有人甚至提议建立“金庸学”；另一方面，金庸在北大等数所大学，获得“客座教授”等荣誉职位，进而又获得了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头衔。

“中国文学网评”是一家社会性很强的评述单位，他们公然提出：“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报业巨子，更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创作家。将其定义为一代通俗文学大师是恰如其分的。既然称做通俗文学大师，还是有必要通过他的小说进行一番文学雅俗观的论辩。”

“凤凰网”的说法同样为公众所熟知。他们认为：“金庸的作品所表现的深厚意蕴确非古龙、梁羽生所能及，他不仅是现代武侠小说的‘集大成者’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代名家。”

所有这些，毋庸置疑。他和他的武侠小说作品，已被广泛接受。

细究起来，“武侠文学”的源头当有二：一是汉初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的游侠、刺客列传；二是魏晋、六朝间盛行的“杂记体”神异、志怪小说。从魏晋时代起步，先后经过了“唐传奇”“宋元话本”与“明清白话”，随后，又经过了民国时代，才落胎于公众熟识的“当代武侠”。毋庸置疑，金庸、古龙和梁羽生，恰是香港“新武侠小说”的优秀代表。

算起来，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《红线》与《聂隐娘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了，其后，还有《七侠五义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等。严格地说，《水浒传》也未尝不是武侠小说作品。若武侠小说当真不过是一种轻松舒缓的“消遣品”。为什么这些作品可以经过千百年流传至今而不被历史淘汰掉呢？可见，武侠小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，有它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知识性，堪称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。

中国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“武侠小说”，当属清代的古典名著《三侠五义》。其实，后世的武侠小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上是指，传统武侠、浪子异侠、历史武侠、谐趣武侠、奇幻修真与现代修真，但从武侠小说的狭义层次上来说，就只指传统武侠、浪子异侠、历史武侠与谐趣武侠这四类。

谈到金庸先生所擅长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很难回避这种特殊文体的缘起与兴衰。所谓“武侠小说”属于中国旧式“通俗小说”的一大重要类型，多以公众喜爱并接纳的“侠客”和“义士”为主人公，细致地描写他们身怀绝技、见义勇为和“造反行为”。很明显，任何一部武侠小说尚未开篇，就已经预先构筑起冲破枷锁、颠覆秩序、踢翻皇权或者创立自我的崭新模式。尽管这种人生模式非常崭新，却独具一种难以根除的造反精神与破坏性。上述“先天矛盾”足以吸引情投意合的读者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钻进作家悉心构筑起来的“武侠世界”。

二、“金庸热”，势头强劲

在当代文学史上，很少出现“热风潮”。单就中国现代的文学流派来说，后人无法掩饰“海派”“新海派”以及“京派”的流行足迹。“海派”代表作家有穆时英、施蛰存等。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半殖民地、商业化的中国大都市——上海的真切生活。“新海派”则以张爱玲为代表，类似作品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，既有现代，又有通俗，雅俗共赏，可读性强。“京派文学”网罗了老舍、沈从文等文坛名家，



他们注重人性主题，主张文学的独立与艺术性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，流行于台湾的“琼瑶热”，风靡香港的“金庸热”，抢滩登陆了。专门拿作家的名字当作招牌，无疑想证明，这位出类拔萃的作家及其作品，已经变成了受众如云的“黄金佳作”抑或“钻石名品”了。

反观那段“武侠小说”翻云覆雨的年代，清晰地发现，20 世纪 50 年代，的确属于梁羽生先生。他最杰出的代表作，显然落到《七剑下天山》系列的头上。

几乎同时代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依次推出。令人惊诧的是，金庸先生创作的作品，从前期到后期，几乎是越写越优畅。此外，从文字到结构，包括情节的张力，几乎都没有逃出这种惊人的格局。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香港武侠小说陡然呈现出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局面。金庸先生审时度势，反倒完满地封笔了。

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古龙先生投身武侠小说创作。可惜，他鲜有佳作，整体显露出缺乏才情、业绩平平的尴尬场景。

金庸先生的“武侠小说”独享殊荣，掀起了一场历史罕见的“金庸热”。金庸“武侠小说”总共 15 部，除《越女剑》（短篇小说）（1970 年）外，它们可以由这几句话描述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”具体篇目分别是：《飞狐外传》（1960 年）、《雪山飞狐》（1959 年）、《连城诀》（1963 年）、《天龙八部》（1963 年）、《射雕英雄传》（1957 年）、《白马啸西风》（1961 年）、《鹿鼎记》（1969 年）、《笑傲江湖》（1967 年）、《书剑恩仇录》（1955 年）、《神雕侠侣》（1959 年）、《侠客行》（1965 年）、《倚天屠龙记》（1961 年）、《碧血剑》（1956 年）、《鸳鸯刀》（1961 年）。

那些篇目当中的主要角色，更是深入人心了。比如，《天龙八部》当中的段誉、虚竹与乔峰，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的张无忌，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令狐冲和东方不败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郭靖、黄蓉、杨康与梅超风……说起来有趣，金庸先生居然在 15 部武侠小说当中，塑造了性

格各异、殊途同归的“武林高手”与“世间奇士”。与其说，江湖绿林在动用心机、施展斗法，还不如说这些武林中人，都围绕着金庸先生预设的棋局，一门心思地动脑子，策动杀机呢。平心而论，五花八门的江湖仇杀与性情突变，绝非普通读者足以预感的，最要命的无非是“武侠小说”的作者们，提前组织策划，把世间的隔代恩怨与过往杀戮，紧紧地缠绕在一起，最终，有条不紊地驱赶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性，从而引发一场尘世之间的诱引与杀戮。这些符合人物个性，暗合时光走向的人性斗争，反倒把现实社会演变为“小品奇观”了。回头再看，这恰恰是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，那些故事的最终导演，个个儿都逃不过握笔微笑的金庸先生。

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，专门著文《金庸热：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》。刚开篇，他就直截了当地写道：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，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金庸！”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“迷”，同时，也带来了许许多多“谜”。

1991年，严家炎先生曾在斯坦福大学的“东亚图书馆”作过一场调查。那家图书馆藏的金庸“武侠小说”，每一册都被借出过几十次、甚至上百次，这些记录单从另设的“借书日期”“还书日期”栏内盖的戳子，就可以窥探个大概其了。“东亚图书馆”收藏的金庸武侠小说作品，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。毕竟，参与直接借阅的学生与教师，实在太多了。

其实，金庸“武侠小说”最初发表在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众报纸上，发表之初就已拥有大量读者。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，到1994年止，正式印行的已4000万套以上。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，那么，读者就多达两亿人次了。不要忘记，金庸“武侠小说”在华人世界早就出现了很多“盗印本”。客观地说，那些“盗印本”的总数，并不在正式出版的数量以下。据《远东经济评论》“文艺和社会”栏目的资深编辑粗略估算，历年来，金庸“武侠小说”的销售量，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，累计高达一亿册。显然，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天文数字。



更有趣的是，每一本畅销小说的实际阅读量，往往会超过实际销售数目，那些货真价实的读者群体，极有可能比最初的印刷数目，膨胀出几倍以上。

严家炎先生认为：“金庸热”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、令人瞩目的阅读现象，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，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。一、持续时间长。二、覆盖地域广。三、读者文化跨度很大。四、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。

先说持续时间长。必须提一下金庸先生倾注过精力与心血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最初，那部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时，很多报纸受众奔走相告，乐不可支，有趣的是，那份刊发金庸小说的“幸运报纸”，发行量陡增，一下子就飞升到意料不到的地步。当时，港澳地区犹如变戏法一样，惊现“金庸热”。此后，随着《神雕侠侣》《天龙八部》与《笑傲江湖》等作品的频繁露面，似乎昙花一现的“金庸热”，居然跳进了长盛不衰的“黄金期”。

再说覆盖地域广。金庸作品的读者，不只密布在海峡两岸与东亚地区，而且，还伸展到了北美、欧洲与大洋洲等华人聚居的社会，毫不客气地说，只要是华人共同生活的地域，无论是哪种地理坐标、哪种肤色为主，哪种文化聚集，都无法阻挡金庸“武侠小说”的流传与植根。

还有，读者文化跨度大。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、青年学生和朴素的农民喜欢读，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、政府官员、大学教授以及科学院士都爱读。比如，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，美国的著名科学家、“诺贝尔奖”获得者杨振宁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等，他们都是“金庸迷”。此外，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专家们，自身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与专业知识，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。显然，那种亲身参与，既是一种批判，同时，也属于高质量的文化欣赏。

末了，再说“金庸迷”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。在“金庸迷”当中，

有持各种政治观点的风云人物，大家对金庸小说的看法竟然相当一致。一方面，喜欢谈论；另一方面，喜欢思想弥合。比如，改革开放的“总设计师”邓小平，称得上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“发烧友”之一，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邓小平先生从江西返回北京，立刻托人购买到一套金庸小说，每有时间，他就翻卷阅读。1981年7月18日上午，邓小平接见金庸先生时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的小说，我是读了的。”

由于金庸先生的“武侠小说”深受欢迎，不少痴心文学创作的人们，都提笔来撰写五花八门的阅读感想与色彩缤纷的艺术评论。与之相应，诞生的恰恰是大名鼎鼎的“金学”。很遗憾，作为当事人，金庸先生对这称谓，明显抗拒，至少，他认为，这种做法有高攀专门研究《红楼梦》的“红学”之嫌。沿袭了一段时间，学术界大多数改称为“金庸小说研究”。其实，无论是“金学”，还是“金庸小说研究”，无非是换汤不换药，最要紧的逃不过两个词：其一，金庸本人；其二，金庸“武侠小说”。

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，承袭了这一文类的特点。金庸先生在创作过程中，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、文化、社会以及历史内涵，典型地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。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，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评话、弹词与说书等演变而来的。在内容方面，与武侠有关联的四大名著中，就牵扯到三部；在形式方面，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，江湖恩怨、门派斗争、武林纷争、男女爱恨抑或兄弟情义等内容，照例还是“新派武侠”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，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，正如金庸先生所说：“武侠小说所继承的，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，就内容而言，武侠小说和《水浒传》差不了多少，当然，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，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，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。”鲁迅先生曾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上，提到《七侠五义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，鲁迅若再生，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、古龙小说和梁羽生小说。一个真正的思想巨人评价文学作品时，往往不带任何功利色彩。

此外，金庸小说袭用了“旧小说”在行文时夹用诗词、歌赋、联句，



在回目中使用对联、诗词，在语言上使用白话、夹用韵文等特点。金庸先生在行文时，很会追逐古典诗词与民间词话，像元好问的《摸鱼儿》、丘处机的《无俗念》、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与李白的《侠客行》，等等，都运用得浑然天成。1978年10月，金庸先生在《天龙八部》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：“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，作为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回目，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。”他还颇费周章地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，选了五十行对句，作为《鹿鼎记》的回目。不过，金庸先生也在几本书中，没有坚持“通俗文学”固有的思维惯性，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
还有，金庸小说潜移默化地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，比如，说书艺术、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、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、戏剧舞台的架设、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，等等。

比如，在人物的塑造上，金庸先生依靠视觉与心理的运用，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，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，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，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，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，最成功的“虚伪家”。

再如，周伯通、桃谷六仙、岳老三、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，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，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。难怪李渔先生曾在《闲情偶寄》表示：“插科打诨、填词之末技也。然欲雅俗同欢、智愚共赏，则当全在此处留神。文字佳、情节佳，而科诨不佳，非特俗人怕看，即雅人韵士，亦有瞌睡之时。作传奇者，全要善驱睡魔，睡魔一至，则后乎此者虽有《均天》之乐，《霓裳羽衣》之舞，皆付之不见不闻，如对尼人作揖，土佛谈经矣。”看来，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的创作当中，非常倾心于姊妹艺术之间的借用与模仿，正因如此，金庸小说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。

三、“金庸热”，自生筋骨

对于武侠小说，常人往往分为两大欣赏族群。或者调笑指责，总

以莫名其妙的江湖打斗而抛弃；或者爱之倾心，作品不容指点，动不动就把不同时期的作品，抱到老天爷的尊位上。问题是，金庸先生的“武侠小说”与梁羽生、古龙作品，远远不是一回事，毕竟，金庸小说生有无可替代的血脉与筋骨。说通俗一点，金庸小说“游戏”而又有其“味”，“胡说”而又有其“道”——有味有道，雅俗共赏，的确称得起锦绣文章。

首先，金庸小说绝非一味地“供养传奇”或者“坐地讲故事”，而是，锲而不舍地深入人心。

金庸小说的妙处在于，事件奇妙，同时，人物的感情日渐真切，所谓求真求实，堪称创作武侠小说难以抵达的境界。这恰恰印证了金庸小说的过人之处，那就是以人统率着故事，绝不能唆使故事支配人心。

武侠小说在创作过程当中，脱离不了两大病态：其一，小说当中的人物，尤其是其主人公，不仅善恶分明，正邪两道，而且这些人物简直就是某一种概念的公式，让人一看就知，了无生趣。其二，根本没有什么人物性格，只是追求一种离奇古怪、荒诞不经，甚至漏洞百出、低级下流的“故事”或“传奇”。当然，更高明的做法是让以上两种情况“合二为一”，也就是把一些概念化、公式化的人物与故事，尽量融会在一起，这样做似乎能够避免读者的挑剔与指责。

金庸小说的故事情节，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于人物的性格，这种趋势一直统率着结构庞大复杂的故事。显然，金庸小说的故事情节，总是按照人物的性格发展需要及其可能性、必然性等去安排的。比如，《神雕侠侣》中的“小龙女”跳崖不死，一是因为她偏爱杨过，情愿为之赴汤蹈火；二是因为她早年生长于古墓，又习“玉女心经”，所以能长期安于寂寞。十六年后，杨过之跳崖，一是因为他对于“小龙女”之死，感念在心，至情至性；二是因为他的性格本身就是有易走极端，这种行为标准，恰是杨过日常行为的一条“软肋”。

其次，金庸小说高居他人不及之处，作品将“传奇”与“历史”，打磨到珠联璧合的理想境界。

一般的武侠小说，总是写到江湖上的一己恩怨，绿林中的明火执仗，



草莽间的凶杀打斗。金庸武侠小说则是每每将“历史”引入“传奇”，从而使其浑然一体，成为古代中国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，兼而成为中国古代的“英雄史诗”。金庸小说大多有明确的历史年代及其具体的背景，之所以如此，隐藏着一种创作秘密，那就是期望增加每部作品、每段文字的“可信性”。然而，这样做的意义与作用，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。除了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之外，还应将“历史引入传奇”。

在金庸的小说当中，活跃着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，然而，他们的事迹则多半是出自传说或野史的臆造。与此同时，金庸先生又努力将虚构的人物及其故事，写得更真实、更可信。经过真真假假的移位与更换，所谓“真人假事”与“假人真事”竟能浑然一体，叫人不能笃信，也不能不信。巧妙得很吧，在“历史事实”这一层次上，的确是不可信的，但在“艺术真实”或“哲学真实”这一层次上，又“极可信”。显然，金庸小说具备了独特的风采及深刻的底蕴，这恰恰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无我有、人有我强的奇特之处。

四、“金庸热”，难疗“硬伤”

金庸先生曾经非常直率地自况道：“有人常问我，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？当然，其中原因很多，不过，我想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，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。”“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、侦探小说，或什么小说，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，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，那完全没有关系。武侠小说写得好的，有文学意义的，就是好的小说，其他小说也如此。毕竟，武侠小说中的武侠，只是它的形式而已。”

作为当事人，金庸先生能讲出上述心得，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了。不过，这很难一下子褪去“武侠小说”创作难以根除的“硬伤”，即便金庸先生那么有成就，依然对此无计可施，无能为力。

第一大“硬伤”：武侠小说，早已由盛而衰、行至低谷了。

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化受众而言，最理想的时代当属 20 世纪六七十

年代了。当时，作家鼎力，佳作辈出，已经形成了震撼人心的“金庸热”，如果那种场景能多维系几年，那么，武侠小说作为独特的文艺形式，肯定能更加深入人心；很遗憾，赶到20世纪70年代初，金庸先生已经预感到了即将丧失如日中天的风光，因此，写完短篇小说《越女剑》之后，立刻打扫战场，宣布封笔。

眼下，早已物是人非，缺少了再现“金庸热”的社会氛围，即便出现崭新的作家继续创作，而且，能引领一些读者阅读，恐怕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区区的“小众”了。跟当年的“金庸热”相比，人力、物力，都无法超越了。

“武侠小说”的内核，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“侠”；武侠的外在要素，也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“武”。平心而论，单就这个层面而言，恐怕金庸、古龙和梁羽生等先生们，早已经写到家了。金庸先生凭一己之力，将武侠推到了文学的最高峰，将“武侠”诠释到了哲学的高度。究竟什么是“侠”，怎么做才叫“侠”？一连串的问题，金庸先生都想到了，也展示给了世人。换句话说，能写到这种份儿上，早就足够了把。

比如，郭靖和萧峰。郭靖是明显的“侠之大者”，为国为民。萧峰更高，萧峰的侠，渗进了骨子里。不仅仅再是为国为民，而是为了天下。此外，还修炼成了一种牺牲自我的“献身精神”。

再如，杨过与韦小宝。杨过的侠，在于他的“自由”和“思考”。杨过是金庸小说中为数不多、有着鲜明性格的人。他没有像郭靖那样投身为国为民的事业。这种侠，是隐士的侠。与此同时，韦小宝也是“侠”，那种“侠”已经脱下了侠客的外衣。韦小宝就是金庸在侠义精神上新的出路。侠，不再局限于人、身份。如果说金庸的“侠”是人们期望的，那么，古龙的“侠”则局限于自己，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过人之处。

其实，把“武侠”上升到金庸先生所抵达的那种层次，恰恰就足够了，即便生命再次重复，也无非是周而复始的重复吧。

第二大“硬伤”：大部分读者欣赏转向，已经不再急需武术与侠客了。

扪心自问，广大读者为什么需要“侠”呢。大众需要一个绝对客



观公正的第三方来帮助弱勢的自己。所以，往往在世道混乱之时，侠客最多，人们也最需要侠客，因此，才心灵共鸣地精读金庸先生塑造的《鹿鼎记》。最后，陈近南死亡、韦小宝隐退，此外，再加上康熙皇帝深入民心的治理。读者很快就会明白：生活在太平盛世，所谓“侠客”早就丧失插根立足的特殊意义了。

说实话，眼下的进步，哪怕每一天都是非常巨大的。古人云：侠以武犯禁。法治国家用不着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武术身上。看来，阅读源头的干涸，加上读者群体的稀释，最终，必将导致“武侠小说”的“式微”，乃至沦陷、衰亡下去。这种局面，恰恰是金庸先生早已预料到的。

每一种文化都需要制造公众喜爱的“成人童话”，用以安顿人们被生计与名利折腾的疲惫心灵。那些“武侠传奇”，作为中国人的“成人童话”，有深厚的历史传统，它的主角是一些神乎其技、侠义心肠的人物，通常担当除暴安良、扶助弱小的责任，既满足人们的英雄情结，也寄托“升斗小民”对人间正义和安稳日子的希望。因此，武侠传奇在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之中，一直相当有市场。与之相应，民间道德观、价值观的变迁，也在其中得到生动鲜活的展现。这一通俗文学类型发展到1950年之后，以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等人为代表的“新武侠”阶段，不仅融入了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意识，更在文体上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。

“新武侠小说”，一方面大量吸纳、消化了言情、推理等其他通俗文学类型以及西方“流浪汉小说”“成长小说”等类型小说的模式和内容；另一方面，也有意识地在通俗的题材、情节中，融入严肃主题和叙事技巧，扩大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空间，提升了武侠小说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涵，拓展了武侠小说涉及的社会人性的深度和广度，从而不遗余力地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。因此，“成人童话”期望升华理想、更换血液的同时，随即显现出了向“严肃文学”与“正统文艺”靠拢的蛛丝马迹。

由此想到了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名著《天龙八部》，其中，有一

个“珍珑（围棋术语）”，此局棋劫中有劫，既有长生，又有共活，或反扑，或收气，那种怪异的局面复杂无比，无人可破。小说中的主角——段誉，棋道十分高明，却因不肯抛却一兵一卒而败；而慕容复因为太过忍心，抛却兵卒而败。最后竟是，一个小和尚虚竹自杀了一大片白棋，才破了“珍珑”。

显然，这是人生当中“以退为进”的精辟表达。慕容复不懂以退为进的道理，一味冲杀，进不了时，只好绝望得想死；而虚竹杀了自己一大片棋后，情势顿见开朗，大有回旋余地，不再缚手缚脚了。这一看似败退的棋招，竟给白棋带来了无限的生机。

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对于只顾奋力向前的人来说，有时不妨也退后一步。在许多情况下，在前无进路之时，退一步，可能会海阔天空。“以退为进”的智慧，总要比一味冲杀、力争冠军的窘境，好很多吧。

其实，令人钦佩的“武侠”，绝非打打杀杀，而是一种深厚的情绪、一种默默无言的文化。对于金庸先生而言，他恰在刀光剑影的“武侠天地”中，跳出你死我活、时代仇敌的小圈子，反倒牵引着文化的丝带，昭示读者们一个“棋外棋”，一个“局外局”，有趣的是，“弦外之音”与“席间棋子”，恰如道士悟道、高僧讲禅，只有这种时候，才可能与智慧串联在一起，看得更深，走得更远……

世间的道理，瞬间一清二楚，英勇武侠手上的明枪暗箭，还能有多大的用处呢？